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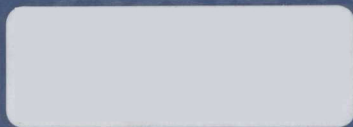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Annihilation of Inertia: Dostoevsky and Metaphysics

根除惯性(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美]莉莎·克纳普◆著

季广茂◆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Annihilation of Inertia: Dostoevsky and Metaphysics

根除惯性(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美]莉莎·克纳普 ◆ 著

季广茂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 (美)克纳普著;季广茂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38-6

I. ①根…

II. ①克… ②李…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F.M.(1821~1881)—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302 号

根除惯性(上、下)

著 者:(美)莉莎·克纳普

译 者:季广茂

责任编辑:崔文辉 于二辉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2.75 字数:45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38-6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20 世纪西方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序言

林精华

众所周知，巴赫金的国际性意义是经由欧美学界展开来的，虽然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20 世纪的世界性价值也是由西方发现并推演而来的，但可以肯定没有他们那富原创性的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遗产至少不会成为 20 世纪知识分子应付社会变迁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而且，诚如巴赫金的普遍性价值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伟大性也不是西方学者人为假定出来的，而是对作家本体的知性描述和心性体验的结果。

早在 1928 年德国批评家 Julius Meier-Gradfe 在其长达 406 页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1928）中就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探究的诸多领域都是为前辈们所不知的……在不久的将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力就会像歌德或席勒那样，甚至已经是如同莎士比亚那样发生了作用，这不是夸张的假定。只有他这样一个俄国人才获得这种全欧洲性的影响，而在我们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并不是任何一种时髦的大众化诉求都被容许存在的”^[1]。稍后不久，弗洛伊德（S. Freud）在其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亲》中断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个性中有 4 个重要层面：创造性的艺术家（creative artist）、神经病患者（neurotic）、伦理学家（moralist）和无神论者（sinner），其中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家是最无可置疑的——其位置远不在莎士比亚之后，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宏大小说，特别是那里面的“大法官”插段叙述是世界文学的顶峰之一^[2]。很快，英国重要文学家劳伦斯

(D.H.Lawrence) 在给《大法官》这个片段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1930)生动地描述了他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激动情景:头两次阅读因为作品叙述得太真实而被击倒,第三次阅读该作依旧有那种从头凉到脚的灵魂震撼。当然,20世纪初的这种情形与19世纪后期西方一批重要文学家和学者普遍的积极阅读是不无关系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斯蒂文森(RobertStevenson)1886年春天致友人书信中说“《罪与罚》是我最近十年来阅读到的最伟大作品”,美国小说家豪威尔斯(WilliamHowells)1886年9月在著名的《哈帕斯新月刊》杂志(Haper NewMonthJyMagazine)上著文《关于{罪与罚)的一种批评》声称此乃震撼人心之作,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9)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列一节并断言《罪与罚》乃叙述时代的巨幅油画,而在英国重要文学史家Wal-iszewski 著述的《俄国文学史》(1910)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创造性接受与俄国经验

事实上,西方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是来自个人经验式的印象批评,而是有很深厚的俄国经验的基础,或者说是在重视俄国阅读实践基础上理解这位作家的。

白银时代重要文学家和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1902年出版的杰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就被译成英文并以《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出版(1970年著名的绿林出版社再版);克鲁鲍特金1901年在罗维尔研究所(TheLowellInstitute)发表的演讲《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也于1906年被收录在他《俄罗斯文学》一书的英文版中在西方发行;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弗拉基米尔·谢杜罗(VladimirSeduro)的译文集《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956》,该译作收录了别林斯基论《穷人》(1846)和《女房东》(1847)、杜勃罗留波夫论《双重人格》(1861)、皮萨列夫论《罪与罚》(1867)、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1873年日记、白银时代一批文学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篇目。不仅如此,苏联理论家康斯坦丁·穆楚尔斯基系统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

路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1947）也由著名学者米切尔·米尼汉（Michael Minihan）翻译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7 年）。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诠释》，于 1957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译者 Donald Attwater）。特别是，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e Wlelek）曾编辑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论文集》（Prentice—Hall, Inc, 1962），其中收录有德米特里·奇捷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主题》（1929）、卢卡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43）之类重要篇章。此外，1961 年沃德沃斯出版公司推出英文版译文集《（罪与罚）及批评》（由 Edward Wasiolek 翻译），它收录了苏联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叶尔米洛夫综述苏联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论文《苏联观点：1956 年》等一系列重要论作。而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力作《自由与悲剧生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研究》，也于 1952 年由卡梅伦（Norman Cameron）翻译成英文出版（Nooda~出版社）。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重视俄国阅读经验的传统，没有因为冷战而终止，也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急剧膨胀，而是一直有序的延续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2 年出版了罗伯特·斯宾塞（Robeas Spencer）翻译的白银时代哲学家罗赞诺夫之著名论文《大法官传奇》（1906）英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大法官传奇》，科特连斯基（C.C.Koteliansky）教授 1974 年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新编》（Haskell 出版公司），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诺顿批评研究文献》（No.on&Company, 1975）则收录了斯特拉霍夫（作家的朋友和著名出版家）的《虚无主义者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新理念》（1867）、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批评家楚尔科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创作的》（1939）、苏联杰出学者弗·艾夫林的《情节结构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犹豫》（1948）、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以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的《小说结构》（1959）等俄国批评界的重要论文。特别是，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也于 1973 年由罗茨尔（R.W.Rowel）译成英文出版（Ann Arbor 出版社），1980 年代得到再版，这对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水平发生了革命性影响。此外，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教授克娜普（Liza Knapp）主编和翻译了《作为改革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Ardis 出版社 1987 年英文版），杰弗森教授（N.C. Jefferson）编辑整理了长达 370 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选自当代论文集和优秀期刊的第一批书目汇编》（McFarland 出版公司 1997 年英文版），该书在长达 13 页的导言中说明了这种工作的意义，最后还附有作家很详细的年表和注释性参考书目，很有学术价值。

这种重视俄国资源的阅读传统，确定了西方在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上的规范性，也为他们的创新准备了基础，或者说西方创造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无中生有、异想天开。20 世纪末俄国学术界大量翻译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果在内的西文学学术著作，显示出西方学术成果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正是源自俄国基础文献与西方理论的结合。

接受的新阶段：走向综合性

20 世纪前 40 年欧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以介绍作家传记、基本情况、综合性评述为主，参加讨论的人没有专业限制，讨论的阵地也不限于专业学术报刊。

英文畅销报纸《观众》（The Spectator）早在 1912 年就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9 月 28 日）（该文围绕几部重要作品来介绍这位伟大作家基本情况），重要学者斯塔拉切（Lionel Strachey）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幽默特点的重要论文《一位俄罗斯幽默作家》最早也是见于该报（1914 年 4 月 11 日）。当然，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远不限于这份报纸，艾肯（Conrad Aiken）在其《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中比较早地借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作家心理和感情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作家整个创作历程，这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最早刊于《自由民》（Freeman）季刊^[3]。西蒙斯（Emest J. Simmons）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小说家的诞生》（1940）则由一家图书公司推出，这是一种注重叙述作家精神



成长的传记，他仔细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长为独特心理小说家的生活历程及显不在文学文本上的证据。而本奈特（Arnold Bennett）的《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刊在《新年》（New Age）（1910年3月31日）上，该文很风趣而又有特色地比较了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差别。拉波瑞恩（Janko Labfin）那部不大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研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47年英文版），却是比较早地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小说史上贡献问题之作，作者在此认为“他扩展了欧洲小说创作的范围或领域”。上文提及的德国学者 Julius Meier-Gräfe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则以印象主义方式叙述作家传记过程和评述其主要作品，因其叙述和评述得比较全面、独特、深刻而享誉西方斯拉夫学界，当年就被译成英文。至于英国传记作家和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著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新传记》（1931）透过作家精神危机的发展历程评述其整个创作。此外，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写作的英国重要小说家巴林（Maurice Baring）非常热爱俄国文学，在1910年出版的《俄国文学中的几处重大标志》中专列一章，全面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文学史标志性作家的基本构成，并在对《卡拉玛佐夫兄弟》之类重要文本的几位主人公形象分析过程中，确信作家是维护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者^[4]。而这种阅读，正好吻合这位英国作家本人作为著名基督教辩护者（apologist）的身份。这些情形表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塑造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还不是很学术化的：公共传媒能成为介绍这位复杂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重要传播载体，对作家讨论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叙述方式等并不具有专业文学研究特点，这种接受也大大丰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

不仅如此，试图对作家进行本体论的评价，或者说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找出明确主题、寻找作品思想、确定作品风格等，也是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趋向。Middleton Murry 作为英国文学批评家尽管以关心现代批评理论著称，但是在其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批评研究》（1916）中却批评英语读者不该无限地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

反对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life）这种传统阅读，认为作者不可能做得到这样，声称持此论的人是把对文本的认识建立在虚设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比起其他作家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入人心的心理小说家，其同情怜悯之光耀眼地普照着黑暗和野蛮国度。在这种阅读视域下，他细致地探究了作为一种象征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文学、审美与宗教三者间的关系：父亲费朵尔·卡拉玛佐夫是混乱无序的能量（chaotic potentiality）之象征，儿子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乃奢侈享受（voluptuousness）之象征，伊凡是知性（intellectuality）的象征，阿廖沙则为先验灵魂（transcendentspirituality）之象征，从而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追求宗教主题的作家^[5]。法国著名批评家和作家安德鲁·纪德（Andre Gide）在法文版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1923）中尝试不是根据德行或心灵的好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分为积极/消极或好/坏两部分，而是依据人物自尊的程度探讨作家笔下主人公有超越于性别意义的男女之分——所有男性没有一个是特别值得尊敬的，而所有重要女主人公都因其自尊而令人感动^[6]。英国批评家查尔斯·萧（Charles Gray Shaw）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恐怖》一文中认为作家所有重要文本，诸如《白痴》、《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要表达的主题是精神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如何侵袭了俄国民众和知识分子^[7]。同样，瓦尔内（Rex Wameer）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由主义的挑战》（1947）通过对经典文本阅读而探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题的反应、对欧洲社会分化路径的独特理解。

由此可见，这时期西方所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是一个“公众人物”，掌握一定知识量的读者正是通过这种阅读了解这位异域的伟大文学家。

西方接受的继续演化：文本细读式分析

1940年代之后欧美学术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本分析成为主流，对作家传记式批评日渐稀少。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先后兴起的新批评派、叙事学批评、语义学批评等渗透进斯拉夫学术界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客观原因：伴随着文化传媒的日渐发达，欧美社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文学基本情况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因而专业研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要文本都得到了多视角的充分诠释。

首先得到特别重视的是《罪与罚》。在上述所引进的俄国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献中，关于《罪与罚》的研究占有相当比重。不仅如此，著名学者杰克逊（Robert Louis Jackson）主持翻译编辑了《20 世纪关于〈罪与罚〉的诠释：批评论文集》（Prentice-Hall 出版社 1974 年英文版）收录有尼古拉·奇尔科夫 1945—1949 年著述的《一部伟大的哲学小说》、德国学者奥纳斯（Konrad Onasch）教授 1961 年发表的《玛尔梅拉多夫之死》等重要文献等。大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斯拉夫学界重要批评家都涉足过这个领域，而且对这个文本阅读的思路非常宽阔。毕比（Maurice Beebe）作为专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权威，其著名论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三个动机：对〈罪与罚〉的再阅读》（1955）认为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知性、情感和精神三方面冲突与人—神/神—人之间的矛盾，作家的本领就在于用心理学的叙述策略揭示在这个主人公形象身上存在的这种复杂现象，因而单方面认识这个问题是会困难重重的^[8]（该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成功运用新批评方法的佳作）。美国学者盖卜（George Gibian）通过大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和研究著作而后发表论文《〈罪与罚〉中的传统象征主义》（1955），认为传统象征主义既是该文本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水、太阳、空气、植物、大地等不同程度的存有与拉撒路和基督复活相关的强烈意象特征。美国左翼批评家雷弗（Philip Rahv）在著名的《游击队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上著文《〈罪与罚〉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60），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批评方法，讨论这个文本叙述结构的复杂性与作家对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等问题认识的不确



定性之关系，并肯定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位创造出性格多变的主人公形象的伟大小说家，而且其伟大性源自小说叙述的张力。莫蒂默（RuthMor·timer）采用心理学批评方法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梦幻》（1956），包括《罪与罚》中四个梦所蕴含的各种心理学意义得到了叙事学方法的细致描述。而法国学者弗兰克（Joseph Frank）的著作《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世界》（1966）以一个人物形象作为个案，分析 1860 年代俄国激进主义思潮对文学叙述的影响。这些关于《罪与罚》批评的论作，是用科学方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文献，特别体现欧美在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文本上那种严谨精神和细读方法。

同时，《卡拉玛佐夫兄弟》也得到充分重视，并因为这个文本自身的复杂性，欧美学术界对其探讨的视角和方法更趋于多元化。作为德裔美国翻译家、出版家和批评家拉尔夫（RalphMatlaw），他独到地探查《卡拉玛佐夫兄弟》叙述中的神话和符号的用途：对文本叙述中所涉及到的许多概念（诸如“美”、“善”、“人性”、“神性”等）、姓名、火的各种形象，甚至包括各种人物衣着或自然风景或城市建筑中红、黑和白各色等，他运用语义学原理并结合俄国文化传统予以深刻分析，从而解析出为什么后来的象征主义常常要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这一重要文学史传承现象^[9]。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CarolOates）作为美国重要小说家和批评家，其《（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悲剧与喜剧的景象》（载《容忍的极限：文学的悲剧形式》1972 年英文版），感兴趣于文本叙述中的戏剧性诗学风格，并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的独特贡献——叙述的客观性和小说文体的进步。作为英国诗人和史学批评家的卡尔德（AngusCalder），其《反抗与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小说》（载《被发觉了的俄罗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 19 世纪小说》1976 年英文版）特别关心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道德、审美和社会心理各个层面问题，并用语义学方法呈现出这些问题的语言学表述特征。在俄裔美国文学家纳博科夫的杰作《俄国文学讲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论及《卡拉玛佐夫兄弟》则重于描述该文本如何天衣无缝地设



置一个不成功的侦探故事，因为作者本身是高超作家，因而他的论述妙趣横生、又很符合叙事学规则。而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美国重要学者和翻译家特瑞斯（Victor Terras），其力作《卡拉玛佐夫的同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起源、语言和风格》（1981）依据俄国理论家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中“道德剧”之论，研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叙事声音和情节设置的复杂性问题的，在这一诗学透视下该作成为一部戏剧性小说（dramatic novel），叙事者、伊凡、德米特里、作为对佐思马长老声音回应的阿廖沙、费多尔·帕甫洛维奇等人物的声音由此获得了超越小说文体的价值，从而发现这个复杂文本的结构意义取决于对各种人物内心焦虑（suspense）的不同叙述^[10]。瑞典著名宗教学问题专家汉斯·昆（Hans Küng）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超越宗教边界争论中的宗教》（1985）中，把《卡拉玛佐夫兄弟》视为现代世界中基督教启示录或预言性的叙事作品^[11]。而维沃斯（Eliseo Vivas）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真实性的两个纬度》关心小说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俄罗斯”与“欧洲”概念问题，亚瑟（Arthur Traced）的《疑惑之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玛佐夫兄弟》（1988）讨论作家如何叙述传记性语境和信仰问题，艾门德（Victor Amend）专注于《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音乐结构主题问题（载《现代小说研究》杂志 1958 年秋季号），雷弗（Philipaahv）专门讨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大法官》的精神震撼力问题而著文《大法官传奇》。诸如此类的文本分析，普遍体现出运用叙事学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方法论意义。

仅次于《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特别受到西方学术界推崇的作品是《地下室手记》。门罗（Monroe C. Beardsley）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隐喻》（《观念史杂志》1942 年第 3 期）出手不凡，一开始就讨论文本中相当复杂的隐喻意象和结构问题。接着，上文提及过的德裔美国批评家拉尔夫（Ralph Matlaw）的重要论文《{地下室手记}的结构和综合问题》（PMLA 杂志 1958 年第 1 期）着重研究该文本中的叙事过程与象征主义关系，上文提及的美国教育家和批评家杰克

逊则在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俄国文学地下室里的人》（1958）中讨论俄国理性主义“反英雄”的预言式人物性格问题，法裔美国批评家和诗人斯蒂内（George Stiner）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旧批评论文集》（1959）重点之一是讨论《地下室手记》中生理学和心理学内容，上文提及的法国弗兰克则在其长文《虚无主义和〈地下室手记〉》（载《赛旺评论》1961年第1期）从教育学角度讨论青年人反社会的思想或行为与尼采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主义和西方功利主义教育制度之影响等问题（这种论述，在他主持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解放的激动，1865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认为该作是对1840年代社会浪漫主义和18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的滑稽模仿。这卷于1986年问世），著名学者辛格尔（Ronald Hindery）那部《未被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62）对作为道德意识问题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很多情况是依靠《地下室手记》来支持的。

当然，其他文本，甚至包括作家日记，在这时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这时期还出现了综合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趋势。美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的瓦西列科（Edward Wasiolek）在翻译作家日记之后著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小说研究》（1964），很成功地把传记批评与文本分析结合，通过分析作家创作生平与情感变化因素来讨论《穷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白痴》、《罪与罚》等文本中人物价值归属问题，这种研究发现《卡拉佐夫兄弟》中卡拉玛佐夫兄弟家族的信仰危机、子辈反对父辈等问题，与人反对上帝之间的一般性问题之间存有平行结构的意义，这就找到了德米特里与卡杰琳娜、伊凡、斯梅尔佳科夫、人面兽心的文人等象征意义。美国斯拉夫学界著名教授罗伯特·杰克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精神错乱与夜曲》（1981）用分析哲学方法考量许多重要文本中主人公的“意识辩证法”——人性中的同情情感与厌恶情绪、自足的方面与缺欠的方面之间冲突。

也正是在这种综合性研究趋势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意大